

楊照專文推薦



The Wages of Guilt:
Memories of War in Germany and Japan

罪惡的代價

德國與日本的戰爭記憶

獲得巨大且深刻的領悟。

廣島事件卻讓日本人覺得他們是戰爭的主要受害者，彷彿除了原子彈轟炸以外，沒有其他戰爭似的。

為什麼日本與德國人對戰爭觀點和集體記憶，竟有如此大的差距？

伊恩·布魯瑪 Ian Buruma 著

林錚顛 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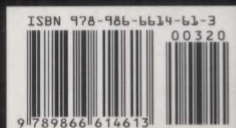
德國人的記憶彷彿是巨大的舌頭，一而再，再而三的要找出那顆疼痛的牙齒。日本人卻認為：德國全神貫注於過去的罪惡，並願意向從前的受害者道歉，這樣一定會導致喪失自己的身分。

二戰結束後，德國誠心悔罪，日本死不認錯，為何有如此大的差異？兩個國家對大戰的看法為何存在鴻溝？彼此的集體記憶為何截然不同？是文化差異或政治不同嗎？又或是根植於潘乃德指出的：日本是儒教「恥文化」，德國則是基督教「罪文化」？作者走訪二戰的代表性城市：奧斯威茲、廣島和南京，並從軍事審判、教科書、紀念碑等各方面廣泛觸及而深入探討，引導讀者從各種立場和角度，來理解這兩個民族在戰後面對自己歷史罪行的態度。

這是我今年讀過最好的一本書 極為引人入勝。 ——諾爾·馬爾科姆《星期日電訊報》

在反思何以這些國家的態度會如此不同的問題上，很難找出比伊恩·布魯瑪更適合的人了。 ——戈登·克雷格《紐約書評》

一本讓你思考與感受，同時讓任何讀者可能讀之再三、內容豐富的書。 ——艾倫·馬西《每日電訊報》



RH15

定價 320 元



博雅書屋



五南文化事業

Original Title "The Wages of Guilt: Memories of War in Germany and Japan"
Copyright © 1994, Ian Buruma
Complex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 2010, Goodness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歷史迴廊 015

罪惡的代價：德國與日本的戰爭記憶

作者 伊恩·布魯瑪 (Ian Buruma)
譯者 林錚顛
發行人 楊榮川
總編輯 龐君豪
企劃主編 歐陽瑩
責任編輯 吳尚潔
特約編輯 李國維
封面設計 郭佳慈
排版 嚴致華

出版 博雅書屋有限公司
地址 106台北市和平東路二段339號4F
電話 (02) 2705-5066
傳真 (02) 2709-4875
劃撥帳號 01068953
戶名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網址 <http://www.wunan.com.tw/>
電子郵件 <mailto:wunan@wunan.com.tw>
法律顧問 元貞聯合法律事務所 張澤平律師
出版日期 2010年04月初版一刷
定價 新台幣320元

有著作權 翻印必究
(缺頁或破損請寄回更換)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罪惡的代價：德國與日本的戰爭記憶 / 伊恩·布魯瑪 (Ian Buruma) 著；林錚顛譯。-- 初版
-- 臺北市：博雅書屋，2010.04
面；公分。-- (歷史迴廊；15)
譯自：The Wages of guilt: memories of war in Germany and Japan
ISBN 978-986-6614-61-3(平裝)

1. 第二次世界大戰 2. 戰爭心理學 3. 民族心理學 4. 德國 5. 日本

712.849

99001882





歷史迴廊

015

罪惡的代價

德國與日本的戰爭記憶

The Wages of Guilt: Memories of War in Germany and Japan

伊恩·布魯瑪 (Ian Buruma) 著

林錚顛 譯

不散的戰爭惡雲——讀《罪惡的代價》

楊照

德國和日本同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軸心國家，同樣發動了對鄰近國家的侵略戰爭，然後在一九四五年，一同面對戰爭失敗後投降的命運。

然而，所有這些相同之處，抵不過兩個國家最關鍵的差異——德國有屠殺六百萬猶太人的罪行，日本卻遭受了人類歷史上至今唯有的原子彈襲擊。

在德國被稱為「最終解決」的舉措，設立了大型的死亡集中營，將猶太人運進集中營裡，陸續送入毒氣室予以有效的消滅。這件事在大戰結束之後，被攻入德國、波蘭境內的盟軍發現、披露，震驚了全世界。

屠殺猶太人的行為，掩蓋了德國在戰爭中的其他作為，成為戰後德國人意識上最沉重的負擔、最難堪的記憶。

德國人為什麼會做出這種事來？大眾，包括德國人自身，不得不問這個問題。不過，這問題基本上是無法回答的，無法找到能夠令人滿意的答案，反而會在追求答案的過程中，引發出更多的問題。

屠殺猶太人，源自幾個世紀「反猶主義」的累積、發展。我們可以追索仇視猶太人心態的歷史變化，羅列激化反猶情結的因素，同時整理德國人民族主義情緒逐漸膨脹的過程，一直到他們自認是純粹、強大

的「亞利安人」，不只是反對、甚至恐懼這樣的血統遭到「污染」，這些都弄清楚了，還是沒有說明為什麼會有大屠殺。

因為要在那麼短的時間內，屠殺六百萬人，是件多麼不簡單的事！六百萬，如此龐大數字的人命，絕對不是你高興消滅就消滅得了的。更何況那個時候，德國一面在歐洲和其他國家為擴張「生存空間」而戰，必須調派、耗損大量人力物力，才做得出大屠殺的行為。那其實對戰爭是極其不利的。

德國人為什麼要做這樣的事？德國人又如何具備那種冷靜到殘酷的理性算計，可以設計出那麼有效的殺人機制？更不可思議的，參與其間執行屠殺任務的人，為什麼能夠冷血無情，極其有效率地盡到這種邪惡的責任呢？

這樣追問下去，必然問到更窘迫的問題：為什麼這些被派去屠殺猶太人的德國人，沒有反對、沒有反抗？擴大來看，一九三三年希特勒是經由民主選舉獲得政權，然後一路重建軍備、組織蓋世太保、發動閃電戰侵略鄰國到下令屠殺猶太人，他在自己的納粹黨內幾乎沒有遭過任何質疑、批判、反抗，十幾年間德國社會，也都不曾集結什麼像樣、堅決的反抗反抗勢力。

德國人沒辦法將罪行推給希特勒和納粹黨，不能主張申言自己是被裹脅、強迫的，因為有太多太多德國人熱切支持希特勒與納粹的明確證據了。

德國人或其他人都無法解釋大屠殺。大屠殺是超越解釋的。這是人類文明不得不重建的一條底線。如果承認大屠殺可以解釋，有說得通的理由，意味著我們接受大屠殺是在可理解的人類行為範圍內，就等於我們輕蔑、矮化了大屠殺的恐怖與震駭。

「解釋」(explanation)無可避免和「合理化」(justification)緊密糾纏。大屠殺絕對不該、不可以被

「合理化」，因而大屠殺也就絕對無法解釋清楚。

德國人付出的最高代價，就是背負著這近乎絕對與不可解釋、不可訴說的罪咎。不只是罪咎本身，還有罪咎帶來的沉默以及自我疏離、自我否定，籠罩了戰後德國。

布魯瑪在書中一再提到米切利希夫婦之經典著作《無力哀悼》，那是一九六七年，戰爭結束後二十二年出版的書，書中第一次正視這種沉默罪咎壓力，對德國社會集體心靈產生的影響。就連提及那份「沉默」，都得等那麼久！

在大屠殺的對比映照下，德國人在戰爭中的損失、痛苦也就微不足道了。其實英美空軍在大戰後期，早在諾曼第登陸之前，就對德國本土發動了猛烈的轟炸，而且轟炸的對象不只是軍事基地和工業設施，還包括了人口密集的都會區。尤其是英國人對德國當年空襲倫敦的惡行惡狀記憶猶新，更是藉機狠狠報復。結果許多德國大城、古城，在炸彈中化為灰燼、廢墟，數十萬平民百姓喪失生命，慘狀令人不忍卒睹。

然而戰爭結束後，德國人卻喊不出一聲「苦」來。要靠歸化美籍的小說家馮內果的魔幻之筆，寫出《第五屠宰場》，才勉強留下了德勒斯登被夷為平地的一點記憶。德國人面目冷漠靜謐地在廢墟中遊魂般走著，承受這一切，因為他們明白，透露出任何痛苦，甚至只是一聲唉嘆，不會引來任何同情，只會惹出怒目相對：「你們也會痛了？那些被你們屠殺了的猶太人的痛苦又該怎麼說？」

戰爭後期，日本的城市也受到美軍空襲轟炸，整體的人命損失並沒有比德國多，然而他們卻不必忍受德國人的沉默壓抑，最關鍵的差異在：廣島。

廣島核爆當然是歷史性的。一瞬間，幾萬條人命在單一的火光爆炸中消失了，而且很大比例完全消失，沒有留下任何屍骨殘骸。人類歷史上沒有看過如此巨大、如此徹底的破壞。更可怕的，帶來破壞的，

只是一顆小小的、很容易裝上飛機從空中投遞的原子彈。

兩顆原子彈迅速結束了日本最後的抵抗，推翻了日本人原來的「玉碎」決心。兩顆原子彈同時也將人類帶進一個新的歷史時期，「核恐懼」的新階段，人類可以靠自己製造出來的工具，毀滅掉整個地球、毀滅全體人類。

後者的震撼效果，顯然遠甚於前者。尤其是接下來美蘇開始進行核武競賽，冷戰架構下核彈頭快速累積，「核恐懼」的程度隨而與日俱增。

在這種情況下，日本戰敗、投降的意義，重要性相形褪色黯淡。「廣島」象徵一個新時代的開端，而不是一場舊戰爭的結束。「廣島」也就象徵了核毀滅的具體威脅，「廣島」是一場真實的夢魘，藉「廣島」讓人類明白了戰爭的破壞升等了、戰爭的代價數十倍數百倍的提高了，也就刺激了人類對於和平更高度、也是更現實的嚮往。

冷戰是戰爭又不是戰爭。美蘇之間的仇視對立緊張程度，等同於歷史上的任何一場戰爭，可是數十年間沒有發生真正的火熱衝突、短兵相接。因為雙方都握有核武器，雙方都知道「廣島」、記得「廣島」，所以再怎樣仇視對立，都還是得維持和平相處的表象，至少維持在不必動用核武器的狀況下。

這對日本社會而言，既是天下掉下來的災難，更是天下掉下來的庇護。日本因此具備了衝突矛盾的雙重身分，一方面是舊戰爭的元兇、戰敗國，另一方面是新戰爭新威脅的犧牲者、受害者。

犧牲者、受害者的形象，塗抹在原本戰爭加害者的暗影上，使得日本人、日本社會得以有所逃避，不必像德國那樣背負多重罪咎，也就決定了日本人普遍面對戰爭責任的不同態度。

戰後日本社會努力將自己重新改造成「和平」的代表。強調「和平」，也就強調了廣島與長崎的核子

爆炸傷害，日本之所以比其他國家更有資格、更真誠擁護「和平」，因為只有日本受過原子彈毀滅的真實經驗，如此一來，也就更加凸顯了日本作為犧牲者、受害者的角色。

六〇年「安保鬥爭」的起因之一，是要和美國簽約建立「自衛隊」。反對「安保條約」的陣營認為此舉破壞了日本的非武裝性，也就破壞了日本好不容易在戰後建立維持的「和平」形象，很可能挑起別人對於二次大戰日本軍國主義侵略角色的記憶，對日本是再糟糕不過的事。

躲在廣島後面、壓抑、淡忘、甚至取消戰爭記憶，是日本社會最基本、最主流的態度，雖然有少數異議人士不能認同這樣的逃避，畢竟還是很難撼動強大的主流架構。

德國與日本的異同，尤其是彼此內在組織的集體心理運作，很少受到認真的處理、對待。這兩個國家分別以沉默與逃避來對待戰爭記憶，是一大阻礙。兩個國家都有各自性格強烈的民族文化，卻一東一西，要同時掌握這兩個國家的歷史，已經很難，要去碰觸歷史中的罪惡責任敏感問題，當然更是難上加難。

這說明了為什麼戰爭結束半個多世紀後，才出現了像《罪惡的代價》這樣比對德、日態度的書。《罪惡的代價》的作者布魯瑪是戰後出生的荷蘭人。德國詩人海涅曾經開玩笑的建議：「如果世界末日降臨了，趕快搬到荷蘭去吧！那裡什麼事情都晚五十年才發生。」這句話雖然是玩笑，卻最精確的點出十九世紀荷蘭在歐洲的形象。那是一個平和、遲緩、沒什麼大事會發生的地方。

然而這樣的荷蘭，卻在二次大戰中躲不過德國佔領的遭遇，而且在德國納粹的刺激、引領下，也參與了反猶運動，整肅乃至屠殺了自己國境內的猶太人。

放在大戰背景中，放在德國的整體作為中看，發生在荷蘭的事，微不足道。然而在荷蘭，這件事產生的衝擊效應，卻再強大不過。

布魯瑪那一代，正是必須承擔荷蘭罪惡感的一代。而要理解荷蘭人自己在戰爭時期的作為，他們非得繞個彎子，從理解德國、德國人、德國納粹做起不可。

布魯瑪又因為個人的生命經歷，深度接觸了日語日文和日本社會。他對日本電影的介紹、分析，很早就西方媒體上佔有一席之地。由電影必然接觸到文學，進而觸及電影、文學的曖昧表現、或曖昧掩飾的戰後日本心靈。

不是德國人、不是日本人，這樣反而讓布魯瑪能夠成為德日集體心靈有效的解釋者。另外，不屬於盟國，不具備戰勝國國民的地位與經驗，更讓布魯瑪可以遠比美國、英國的學者，容易貼近德日敗戰經驗中複雜、曲折的心理狀態。

書中布魯瑪蒐集了大量的書面和訪談資料，雖然訪談主要是九〇年代在德日現地進行的，但大部分內容到今天都不會過時。而且那個時間點，德國正經驗著兩德統一的動盪變化，讓布魯瑪的討論多了一個更豐富的層次：西德與東德，兩種不同政治制度，兩種不同聯盟關係，如何產生了兩種相異卻又相同的戰爭罪責態度。

布魯瑪的書，帶我們進入複雜變幻的德日戰後價值迷宮，幫助我們指認辨識歷史與現實複雜的關係，也幫助我們從簡單、粗糙的戰爭是非責任圖像中解脫出來，朝向對於人性更寬廣也更深刻的理解。

序言：敵人

在我成長的地方，從來就不必懷疑誰是我們的敵人。蘇聯當然是其中之一，不過，在一九五〇年代的荷蘭學童眼裡，它離我們相當地遙遠，所以真正的敵人是德國人。在海牙，他們曾經是我孩提時代的連環漫畫裡的惡棍。當我提到他們——就只是指德國人而非納粹。在一九四〇年到一九四五年的佔領期間，以及隨後而來的憎恨，是屬於民族的而不是政治上的。德國人曾經征服我們的國家。他們也曾逼迫我的父親到他們的工廠裡做工。沿著海岸，他們也留下了許多像石蟾蜍般的巨大地下碉堡，它們是非法佔領之下最接近現代的遺跡，既黑又有濕氣，還飄散著一股尿臊味。我們不准進入裡面。相傳有些男孩子因為違反命令，而被生鏽的德國手榴彈炸死。

我們的老師告訴我們有關德國人邪惡的故事，以及他們本身勇敢的行動。每個舊世代的成員，似乎都曾經反抗過德國人。也就是說，除了在大街角落的屠夫，曾經是個通敵者以外，每個人都是反抗分子，因此沒有人去他那裡購物。還有一個在煙草製品零售商工作的女人，她過去有個德國情人。同樣地，人們也不到她那裡去買東西。

每年五月四日的下午，我們聚集在禮堂，聆聽校長紀念死於戰爭的人。五月四日是紀念日；五月五日了解放日。五月四日的晚上，會有一列緩慢的隊伍走過沙丘，到達舊時的德國處刑場。我在黑白電視上看到這個情形。充滿耳際的是，曳步而行的聲音和遠處教堂的鐘聲。五月四日也是個年輕人的重大活動日，他們打碎德國人的車窗，或者在安全距離之外，羞辱德國觀光客。

校長平常是個幽默的人，但五月四日總是淚流滿面。穿著長長的皮大衣的校長必定走在隊伍的前頭，帶著蔑視的表情，走過沙丘，彷彿將再一次去面對敵人。有一次，我畫納粹的卐字符號被抓到，被他訓斥了一頓。他說，他從不畫納粹的卐字符號，因為他們是邪惡的，而且他們的看法依然使人悲痛。當然我仍繼續畫納粹的「卐」字符號，但只是把它當做一個秘密的壞習慣，因為它附加了一種破壞成人的神秘禁忌的刺激感。

連環漫畫裡的德國人（還有其他任何人嗎？）可粗略地分為兩大類：肥胖、反應慢、荒唐可笑的類型，由好萊塢電影明星加特·弗羅比演來維妙維肖；瘦而陰險的類型，戴著單片眼鏡的酷刑者，經常說：「我們有太多方法讓你從實招來。」那模樣就像在《北非諜影》裡的康拉德·維特。我們的敵人，令人害怕又令人覺得荒唐。由於有許多加特·弗羅比的電影以及對希特勒的模仿，被用來嘲笑德國本身的語言，結果造成了我們拒絕以正確的方式去學習它。當那態度看起來是自我保護的德語教師，設法激起我們的熱情以便學習歌德與里爾克⁽¹⁾的語言時，他哪知道我們的熱情早就毀於弗羅比和希特勒之手了。

在我們的成長過程中，知道了更多故事。我們的歷史感覺，雖然被形塑得像是德國情人與通敵者的地方性故事，但它們也為更大的故事鋪了路，譬如有關集中營以及消滅猶太人的事情。我的母親，只因運氣好出生於英國而遭驅逐出境，所以才能夠逃過幾乎是無法逃過的死劫。因此，我們連環漫畫書的偏見，遂轉變成一種心理上的暴力態度，可是在某方面，這樣可以使得生活變得容易些。當我們知道有條國界將我們和另一個被人格化的邪惡國家分開時，真的令人感到欣慰。因為他們是惡的，所以我們必定是善的。戰後，凡是成長於過去飽受德國佔領之苦的國度裡，應該知道自己是與天使站在同一邊的。

我們不到德國渡假。我們沒有德國朋友。我們幾乎聽不到，更不用說是講這種語言了。當我說「我

們」時，當然只是概括，不過，即使在一九八九年，當我第一次開始頻繁地在德國旅行時，我的荷蘭朋友們彼此，都認為我在做一件有趣但些許古怪的事情。儘管在文化上、在語言上、在飲食上，荷蘭與德國有著明顯的相似，可是對他們而言，倫敦、巴黎甚至紐約，都比柏林來得近。

也許這是問題的一部分：荷蘭所受的苦不像波蘭或俄羅斯一樣深；他們被歸類為「北歐民族」，總之，只要他們不是猶太人即可。在戰前的荷蘭，比起我的老師們在意而去記憶的，對於國家社會主義的紀律以及勇敢面對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優秀民族^[1]的概念，有著較多的支持。德國的入侵，遠超乎戰爭的行動；那是一種背叛。而且它帶來了最嚴重的恐懼感，也就是說，一個小國家經常得處於被鄰近國家併吞的危險中。這也就是為什麼戰後荷蘭不理睬德國的原因。文化的相似是令人尷尬的，甚至是險惡的。在地理上和心理上，都必須清楚地劃分國界；因為德國一定會越軌。

克里斯多夫·伊塞伍德^[2]曾寫過，身為一個死於戰場之人的弟弟或兒子，在一次大戰之後，成長過程會是什麼模樣。他說，那些太過年輕而不能參戰或者死亡的人，感覺上好像他們還必須面對成年期的考驗，這場我們錯過卻也無法挽回的大屠殺有如一個必須一再通過的考驗。對我們在一九四五年以後第一個出生的世代而言，情況不盡相同。雖然如此，戰爭依然投射它的陰影，扼要地說，它困擾著我們某些人的成長過程。因為我們同樣面對一個想像的考驗。然而困擾我們的問題，不在於我們穿軍服如何勇敢地攻山頭、衝進機關槍的火網或者芥氣中，而在於我們是否加入了反抗行列，我們是否在酷刑之下屈服，我們自己是否曾經冒著被驅逐的危險而隱藏猶太人。然而在我們心中的特殊陰影，並非戰爭，而是佔領。

被佔領，始終是件蒙羞的事情——不只因為失去了統治權和政治上的權力，而是因為它戲劇性地暴露出人類的弱點。在這樣的時代裡，很少有英雄，唯有傻子才會將他或她自己與想像中的英雄並列在一起。

人們為了安全地逃出危險的境地，而做出醜陋又微不足道的妥協，提供穿軍服的主管鬼鬼祟祟的服務，當蓋世太保踴躍居的門時掉頭不看，這些事情都還是比較容易了解的。在我成長過程中，每一件事情，不但都經過處理，以便忘掉羞辱，而且還加上了英雄們的確認。我讀過成堆的書，都是有關荷蘭抗德游擊隊員和圍著絲巾的英國皇家空軍飛行員的事蹟。還有那些受驚害怕的人，他們為了自救而背叛他人，他們的看法不同，他們在可怕道德中進退維谷，事實上，我對他們的興趣多於英雄。無疑地，部分原因是，當我害怕時，我自己會更像這些受驚害怕的人。部分原因是，對我而言，失敗比英雄主義更屬於典型的人類狀態。這就是為什麼我想多知道有關我們以往的敵人的記憶，因為在過去他們的所做所為，是個最嚴重的失敗：道德的、政治的，而且到最後連軍事也一樣。這並不是說，納粹比被他們迫害的人更人性，但這也一樣是錯的——無疑地雖然令人欣慰——如果認為他們比較沒人性的話。

另一些二次世界大戰的敵人，也就是日本人，實在太過遙遠因而對於我們的想像沒有太大的影響。荷屬東印度公司對我沒有任何意義，即使甚至我有些朋友出生在那裡。但是，日本人也是連環漫畫中的惡棍：就像在一本廣受歡迎的連環漫畫書中，短小、黃膚、暴牙、戴著眼鏡的人，當他們的零式戰鬥機戰攻擊英勇的美國飛行員時，大叫：「萬歲！」。漫畫的主角是金髮雄糾糾的巴克·丹尼和他勇敢的隊員。（巴克·丹尼絕對是「北歐人」。）人們告訴我，「日本鬼子」^[4]不可信任。他們不關心人類的生命。他們無預警地攻擊珍珠港。他們拔出人的指甲。他們強迫白種女人向天皇下跪。我高中的一個老師像奴隸一樣地為緬甸鐵路工作。我的阿姨曾關在「日本鬼子集中營」。亞歷堅尼斯被迫爬進炎熱的鋼籠中。

由於某些原因，在一九七〇和一九八〇年代，我花了許多時間在日本或和日本相關的事物上，不過和戰爭沒有什麼關係。但我很好奇地想知道日本人如何看待戰爭，「他們」怎麼去記憶它，「他們」所想

像的它像什麼模樣，在審視過去的時候，「他們」怎麼看自己。我所聽到和讀到的，經常令歐洲人感到意外：有關西方戰俘的處理，幾乎全然不記得，即使《桂河大橋》在日本的演出非常成功。（我經常懷疑日本人認同的是日本指揮官或亞歷堅尼斯？或者誰也不是，一個日本朋友說：「我們喜歡那位美國英雄，威廉·荷頓。」）巴丹死亡行軍^[5]、馬尼拉掠奪^[6]、新加坡大屠殺^[7]，這些很少被提到，可是，日本人在中國、滿洲^[8]、菲律賓群島，尤其在廣島和長崎，以及戰後被囚禁在西伯利亞的日本兵等等，這些人所受的苦痛，卻被記憶得非常清楚。日本人有兩個紀念日：八月六日，廣島遭轟炸，還有八月十五日，日本投降的日子。

我想寫的是有關日本人的戰爭記憶，同時這引導我到相關的主題——現代日本國家主義。天皇崇拜者、歷史修正主義者、探索日本人獨特本質的浪漫主義者等，各種人士的著作，令我著迷。他們的看法雖然深奧，但並不妨礙它們廣泛地被刊載在廣受歡迎的日本雜誌和報紙上，或者成為電視談話性節目的來賓。我開始注意相同的德國名字，是如何地突然出現在他們自己的、經常閃爍其辭又過度華麗的散文中：史賓格勒、赫德、費希特，甚至華格納。日本的浪漫主義者越是繼續探索有關日本的本質，他們聽起來越像是德國的形而上學家。到處都有浪漫的國家主義者，這也許是真的，但十九世紀德國的影響，特別是到了現在，依然衝擊著日本。我愈研究日本的國家主義，我愈想求助於所謂的源頭，因為許多日本現代的觀念都汲取自此處。自從十九世紀後期，日本經常把德國視為模範。奇怪的是，多數在戰前吸引日本的德國的東西——普魯士獨裁主義、浪漫式民族主義、假科學種族主義——這些很明顯在德國早已過時，卻仍繼續在日本徘徊不去。為什麼？由於這個問題一直纏繞心頭，決定擴大我原先的構想，而寫些有關德國與日本對戰爭的記憶。

一九九一年的夏天，也就是東西德合併之後的那一年，我在柏林寫雜誌的文章。我注意到在一個地方報紙上有個通告說，在猶太社區中心有個演講，主講者是心理學家瑪格麗特·米切利希。她的演講題目是「記憶的運作」：有關無法哀悼的心理分析，而這個哀悼涉及了納粹時期。我期待有一半的大廳將會是空的，可是，我卻見到一大群人，幾乎都是年輕人，穿得很休閒，倒有點像是參加音樂會的觀眾，排著長長的隊伍直到街尾。我不應該太意外。德國戰爭的記憶，不只留在報紙上、收音機上、電視上、在社區禮堂、學校與博物館；它還活躍地被作用著、運轉著、排練著。有時候，特別是在柏林，人們會得到一種印象，亦即德國人的記憶，彷彿是巨大的舌頭一而再、再而三地，所要找出一顆疼痛的牙齒。

有些日本人對此感到疑惑。我想起一位年老的德國外交官，相當痛苦地敘述他的一位日本同事如何地告訴他說，德國人全神貫注於過去的罪惡以及願意向從前的受害者道歉，這樣做一定會導致德國喪失自己的身分。此外，一位年輕得多的朋友告訴我，他在東京旅行時，令他震驚的是，竟然在一家啤酒館內聽到日本人唱德國軍隊進行曲。我不想故意誇張這個對比。並不是每個日本人都苦於歷史的健忘症，同時也有許多德國人很想忘卻這一些，就像除了環繞於啤酒館的老歌別無其他他能取悅的那些德國人一樣。然而，在東京的某中心，一個日本的瑪格麗特·米切利希能吸引龐大的群眾來聽有關無法哀悼的演講，這是不可能去想像的。而且日本的政客也不會跪下來，如同維利·勃蘭特在前華沙猶太區所做的一樣，為歷史的罪行道歉。

甚至在戰爭期間，軸心國的伙伴關係也不單純。希特勒不得不對黃皮膚的統治種族感到矛盾，同時，日本人畢竟想把「白色種族」推出亞洲之外，可是，這兩個民族卻看到了他們傳說中的美德反映在彼此的身上：戰士精神、種族純粹、自我犧牲、紀律等等。戰後，西德很努力地想消除他們這種形象，但這種舉